

〔第1事件〕2006年（ワ）第6484号谢罪及请求损害赔偿事件・原告王子雄和另外39名
〔第2事件〕2008年（ワ）第18382号谢罪及请求损害赔偿事件・原告吴及义和另外21名
〔第3事件〕2008年（ワ）第35183号谢罪及请求损害赔偿事件・原告刘国珍和另外44名
〔第4事件〕2009年（ワ）第35262号谢罪及请求损害赔偿事件・原告夏振东和另外80名

陈 述 意 见 书

2011年6月1日

东京地方裁判所民事第13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九龍坡区石坪橋石坪村26棟1-6-2

重庆大轰炸诉讼原告 刘吉英

刘吉英

1. 序

我是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叫刘吉英。

我出生、生长在万县大溪口。万县位于重庆东北方向，距离重庆主城区大约300公里，有5个小时左右车程的距离。

1997年重庆升为直辖市后，万县划入重庆市，改名为万州区。在下文中，我还是依我一直的习惯称其为万县。

这里，关于我的出生日期，我想事先说明一下。我中国的身份证上确实记载的是“1936年3月22日”。但是据父母和姐姐告诉我的生日却是1932年2月28日。因此，我今年的实际年龄是79岁。

1939年以后，日本军对万县进行过多次轰炸，夺取了万县很多人的生命，损坏了大量的财产。我在1941年8月份的轰炸中左腿遭受重伤。从那以后，我带着严重的左脚残疾，强忍着巨大的苦痛和不便生活。

2. 重庆轰炸当时我家庭的情况

万县是长江沿岸具有悠久历史的港口之一，位于从重庆顺流而下到武汉的途中，从很早以前开始就作为物资的集散地而繁荣。在直辖市重庆，万县中心港口是仅次于重庆港的第二大港口城市。

很多万县人都秉承传统，从事着跟港口相关的工作。我的父亲刘鸿发也是 12 岁就开始推船谋生。

我父母于 1922 年左右结婚，1926 年生下大姐刘吉秀，1929 年生下二姐刘吉珍，我是老三。

体弱的母亲何永秀在我 2 岁的时候病逝，父亲工作很忙，考虑到没办法照顾我们三姐妹，不久就再婚了。

再婚后，父亲的船生意做得很顺利，几年后他买了一条 100 吨位的两层大木船。父亲又新雇了 20 多个工人，用这条大木船从重庆运送棉纱、食盐、大米等到宜昌和沙市等地，开始做大生意了。

1938 年，我开始在大溪口王爷庙里开设的小学读书。然而，1939 年日军开始了对重庆的轰炸，万县也危险起来。于是父亲说把我们三姐妹接到他工作的两层大木船上避难。我们三姐妹把家里所有的家具财产都搬到了船上，开始和父亲、继母一起在船上生活。这样我也就不得不辍学了。

第二年也就是 1940 年，大姐结婚了。大姐夫也是万县人，有很大的木船同样做着船运生意。父亲和大姐一家联合做起了船运生意。

在 1939 年到 1940 年期间，虽然中国和日本的战争越发激烈起来，但我却在船上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在轰炸遭受重伤之前，我像个男孩子一样活泼淘气，好几次从船上掉到河里，经常被父亲训斥。那时，晚上一般船都不航行，停靠在江边的各个港口，我还记得经常跟着父亲上岸到街上去玩耍的情景。

1941 年 2 月，结婚后的大姐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这是我第一个双胞胎侄女。那时，我常常到大姐一家的船上，逗两个可爱的侄女

玩。

3. 我遭受日军轰炸受重伤的情况（1941 年）

1941 年 8 月 15 日，父亲在万县中心地港口停了船，去万县市内交货物税。然而就在这一天，日本军轰炸了万县。父亲虽然躲在建筑物的墙后面避难了，但炸弹在他不远处落下，炸弹的碎片扎进了父亲的大腿和臀部，父亲受了重伤。由于伤口严重出血不能走动，父亲住进了位于万县中心地的红十字医院。

家人听说父亲在万县的红十字医院住院后，多次下船去医院看望父亲。

8 月 31 日，我家的大船停在陈家坝江边。我和大姐下了自家的大船，从陈家坝乘摆渡船过长江，到对岸去看望在红十字医院住院的父亲。

船到对岸，我和大姐下了船，正爬上十几步台阶，就听见了空袭警报，看见到处挂起了预报日军飞机逼近的灯笼。

年幼的我吓得瑟瑟发抖。周围的人一边高吼着“快逃”，一边喊着某个地名，看到他们逃跑起来，我和姐姐也慌乱地随着人群往同一个方向逃跑。刚跑到一个空坝上坐下来，日本军机就在万县的街上投下了大量炸弹。

我清楚地记得到处无数次响起巨大的声响；浓烟滚滚，周围变得昏暗伸手都看不清楚自己的手指；听到周围到处都是哭泣声、叫喊声。

不知不觉已经看不见大姐的身影，我感到害怕起来。我一边走一边拼命大声呼唤着大姐，然而根本找不到大姐在哪里。

此时我突然感觉到碰着腿的手热呼呼湿漉漉的，低头一看，自己的左腿膝盖处正鲜血直流，我吓得要命。再仔细一看，弹片将左膝处划得皮开肉绽，白白的骨头露在外面。

我觉得胸中像火燃烧一样口干舌燥，非常想喝水，于是勉强继续行走。一会儿我左脚膝盖伸不直了，只能弯着，不能再走路了。

我又累脚又痛，站不稳摔倒在地。为了找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我强忍着剧烈的疼痛往前爬。脑袋变得空白，视线开始模糊，我失去了知觉。

轰炸结束后，救护队来寻找伤员，发现了我，才把我抬到了红十

字医院。在同一个医院里住院的父亲正巧发现了昏迷不醒的我。之后，二姐到医院来照顾我。在遭受轰炸后的第6天，我终于奇迹般地活过来了。

我醒来后，二姐告诉我，遭受这次轰炸后在红十字医院住院的很多伤员都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了；停靠在港边的父亲的大木船被烧光，家里的财产全部丧失；并且，大姐家的船也被烧毁，大姐的双胞胎女儿也被炸死了。

我醒来不久，就转院到位于万县郊外的另一个红十字医院锁口洞。锁口洞离万县县内7公里左右，是一个天然形成的石洞，红十字医院就设在洞内。

这个红十字医院里也收容了很多重伤受害者，但由于医生人数少，基本处于得不到充分治疗的状态。我受伤的膝盖也只能三天换一次药。

我的左膝疼痛难忍，十分痛苦。

9月份的重庆仍然处于酷暑之中，加上石洞里的空气不流通，缠着纱布的膝盖伤口处发出肉腐烂的难闻臭味。这个臭味越发浓烈，闻着连饭都难以下咽。

换药的时候，我看见伤口处有很多蛆在爬。即使一次全部掏出来，不久又会长出很多。

一个月后，不再长蛆了，伤口也没那么臭了。但是，左脚膝盖处的肉难以合拢，很长时间伤口都无法愈合。又一个月后，医生告知我无法再继续治疗，劝我出院。无可奈何，我回到了大溪口老家。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万县轰炸炸伤了我父亲，夺去了我两个侄女的生命，也使我左腿遭受重伤，害我变成了行走非常不便的残疾人。同时，父亲工作的大船被烧毁，我们家的所有财产丧失。我开始痛恨起给我带来如此不幸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来。

4. 大轰炸后万县的生活（1941年——1947年）

出院后，我回到大溪口的老家，跟父亲、继母、二姐和继母的母亲五个人一起生活。

由于没有钱，父亲借钱在药房里买膏药给我贴上治疗。终于在遭受轰炸3个月后，膝盖处的伤口愈合了。

然而，我的左脚还是一直弯着，不能伸直了。走路的时候，左脚

一着地用力，左膝就感到负担，受伤处就会疼痛。因此，我只能右脚着地支撑身体拖着左脚走路。

邻家的小孩经常跟在我身后学我一瘸一拐走路的姿势，嘲弄我。每当那时，我都非常难受。不知不觉，我对自己走路丑陋的姿势感到自卑起来。我悲痛万分，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大轰炸后，父亲失去工作，家里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有时没有钱买吃的，那一天就吃不了饭。

到了 1942 年，父亲终于从以前一起做生意的朋友那里借了钱，买了一条很旧的小船，开始在长江上划船摆渡。此时，二姐离开万县到重庆主城区的重庆裕丰纺织厂上班去了。

1943 年，我的左膝仍然疼痛着。但我已年满 11 岁，便跟着父亲一起在渡船上，帮着父亲摆渡。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中日战争也结束了。

之后，1946 年、1947 年，我都一直帮着父亲摆渡。在那个年代，一般来说，女孩子 14 岁左右结婚，结婚后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家做家庭主妇。我虽然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但因为脚残疾自卑，对人生失去了希望；同时又害怕残疾的自己就算结婚了也会受欺负，所以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嫁不了人了。在遭受轰炸前，我曾梦见过跟大姐一样在 14 岁左右出嫁，然而我的命运却因为日本军的轰炸被彻底改变了。

5. 在重庆的生活：结婚前的辛劳（1948 年——1962 年）

1948 年，结婚一年的二姐强烈劝说我到她家去住，父亲也赞成。于是我离开大溪口，来到重庆市渝中区铜鼓台的二姐家里生活。

由于我遭受日军轰炸成了残疾，二姐非常担心我的将来，极力劝我去上学。1948 年 9 月，我在重庆渝中区西来寺小学开始读四年级。那时我已经 17 岁，比同班同学出大 8 岁。

不久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了。听说革命后女孩子很容易找工作，也为了减轻二姐的负担，自食其力，独立生活，在上了一年学以后，我就辍学开始找工作了。

1950 年，我年满 18 岁，报考了重庆解放军后勤医院等好几个自己想去的工作单位。然而，因为左腿残疾，所有单位都拒绝了我。

我觉得找不到工作的自己一无所用，只是个累赘，感到了深深的

绝望。那些日子，我每天都无法入睡，躺在床上默默痛哭不已。有一天，在重庆街上漫无目的走着的我感到万念俱焚，一时冲动跳入了长江自杀。幸好昏迷的我被好心人发现，经抢救活了下来。

二姐看到我这样，非常怜悯我，坚持要让我继续读书。1952年开始，我又在渝中区达育小学(现中华路小学)读了两年。1954年我终于小学毕业。

之后，我又在重庆市第29中学念初中。1956年，我已经24岁，同时已有6个孩子的二姐家困难至极，我确实不愿意再拖累二姐，于是在读了两年后决定不读了。之后，我一边在家帮二姐带孩子做家务，一边继续找工作。

1958年，我终于被渝中区电镀生产合作社录用了。对我来说，能找到工作自食其力就像做梦一样，所以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特别高兴。

1962年，30岁的时候，我的左腿膝盖突然痛得不能走路。到重庆观音岩外科医院经过照片检查，才知道我的左膝周围残留着数枚弹片。

医院告诉我要尽快做手术，两位陈姓的医生为我做了手术。

至此，从1941年8月遭受日本军的轰炸以来，陷在我腿里整整21年的3块弹片，终于被取出来了。

在手术的时候，医生为了我的腿能伸直，把我的左膝关节下的部分拒掉了3公分。

因此，我穿鞋时，要在左脚鞋子后跟的地方垫上很多张纸，并在最上面垫一张布，以此调整左右鞋子的高度。放在鞋子里的纸和布用不了多久就磨破了，又必须换新的，非常麻烦。

同时，为了固定左腿，在左膝上面和下面分别打了两根金属棒。手术之后一年间，我的左腿一直被这样固定着，生活非常不方便。

经过这次手术，我的左腿膝盖部分被伸直了，比以前弯曲的时候好走路一些了。然而，由于这下左腿再也不能弯曲，实质上，走路也同样不便，没有任何改善。

此外，由于右腿长年承担着整个身体的重量，我的右腿膝盖跟脚踝不堪重负，形成骨质增生，经常被疼痛折磨。

虽然1962年进行了左腿的手术，但之后我还是很容易摔跤，行走仍然危险。

每当看到别人自由地奔跑，我就非常伤心，感到难受。我至今都不能接受自己真的成了一生都不能奔跑的残疾人了。

日本民众、日本政府，你们可曾知道，一个生在万县的无名女性，她的人生被日本军的轰炸所毁灭？你们可曾知道，她一直生活、并且至今仍然生活在大轰炸所带给她的折磨之中？

6. 结婚后的重庆生活（1963 至今）

1963 年，我年过 31 岁。二姐很担心孤身一人的我，多次给我介绍对象。在二姐的帮助下，我终于在 1963 年结婚了。

我的丈夫陆文也是重庆人，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军。退伍后回到重庆，在江津重庆轮船公司做运输工作。我们也就是在这时结婚的。

后来，丈夫又去西藏修铁路，之后再回到重庆印纸二厂工作，一直到退休。

我和丈夫在 1967 年、1970 年分别生下了两个女儿。因为左腿残疾，怀孕期间非常辛苦。而且两次生产都没能自然生产，只能剖腹产。

1986 年，我从工作了 28 年的重庆电镀总厂因病退休，靠退休工资过着并不宽裕的生活。

1987 年，我从一直居住的渝中区搬到九龙坡区石坪桥石坪村。

之后，1993 年我第一个孙子出生，1995 年第二个孙子又出生了。我看着两个孙子可爱的脸蛋独自平复着内心的苦痛，同时，我不由得回想起自己的父亲，在 1941 年 8 月失去他的两个孙子，也就是大姐的两个双胞胎女儿被炸死时他的悲痛。

7. 对日本政府的要求

万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日本军的万县轰炸中，年仅 9 岁的我左腿严重受伤，从那之后成为行走困难的残疾人，遭受了巨大的不便和痛苦，心灵上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使我对人生绝望，甚至一度自杀。

从我受害起，已经过了 70 年了。然而，尽管已经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日本政府从未像包括我在内的大轰炸受害者谢罪过。因此在我的内心，仍然熊熊燃烧着对日本和日本人仇恨的火炎。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谁也无法抹去。我是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和见证人。今天我来到日本的法庭上陈

述，我要让日本的法官、日本政府的代理人知道这个不容否定事实。

这一次，我是在重庆市涪陵区居住的刘凤兰（48岁）的照料帮助下来到日本的。事实上，刘凤兰的母亲张开俊（82岁），在1940年5月30日的日本军重庆涪陵大轰炸中左臂遭受重伤，从肩膀根部失去了左臂。

虽然张开俊并不是原告，但事实上，在本案原告之外，还有很多跟张开俊一样的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并且，不管有没有成为原告，无数的中国人都因为重庆市和四川全省范围内施行的重庆大轰炸而饱受着难以言喻的折磨。我介绍一起来日本的刘凤兰的母亲张开俊，是想让法官和日本国的代理人知道，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规模有多么庞大。

最后，我强烈要求日本法院认真认定重庆大轰炸加害和受害的事实，责成日本国像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谢罪赔偿。只有这样，才能平复悲惨的受害者内心的伤痛，才能熄灭受害者们胸中对日本的仇恨，才能实现真正的中日友好。

以下附上与本陈述书内容相关的资料

- （1）万县地图（1张）
- （2）刘吉英受伤情况照片（4张）
- （3）刘吉英的残疾证
- （4）刘吉英的照顾者——从重庆涪陵来日的刘凤兰的母亲张开俊遭受轰炸受伤的照片（1张）

以上



万州区 重庆市辖区。位于市境东北部，总人口103万。区政府驻太白岩街道。为川东小三峡区，均属纵横、岭谷相间，呈条、天然气、石灰石储量丰富，水能资源蕴藏量大。达万铁路、高速公路和石梁河水库及黄金水道纵横境内。工业以化学、皮革、纺织、机械、食品为主。农业主产水稻、玉米、薯类、油菜子、柑桔、蚕桑、生猪、家禽、淡水鱼。特产“天麻猪”、“五香牛肉干”。名胜古迹有太白山、西山公园、陡龙沟、青龙瀑布等。

別紙



重慶原告劉吉英（1932年2月28日生、79歳）。
歩行のために杖は不可欠である。



前同。左足は右足より3センチメートルも短かい
ため転びやすくゆっくりしか歩けない。

原告劉吉英が爆撃により負傷した左膝の傷跡。



1962年に爆弾の破片を
摘出した際の手術の痕

爆撃を受けて負傷した部位。
傷は化膿し蛆がわくなどし
て傷口がふさがるまで3か
月かかった。

前ページの拡大写真



残疾人证

渝九 字第 10632 号

刘吉英同志为肢体残疾人，特发给此证。



2007 年 11 月 21 日



持证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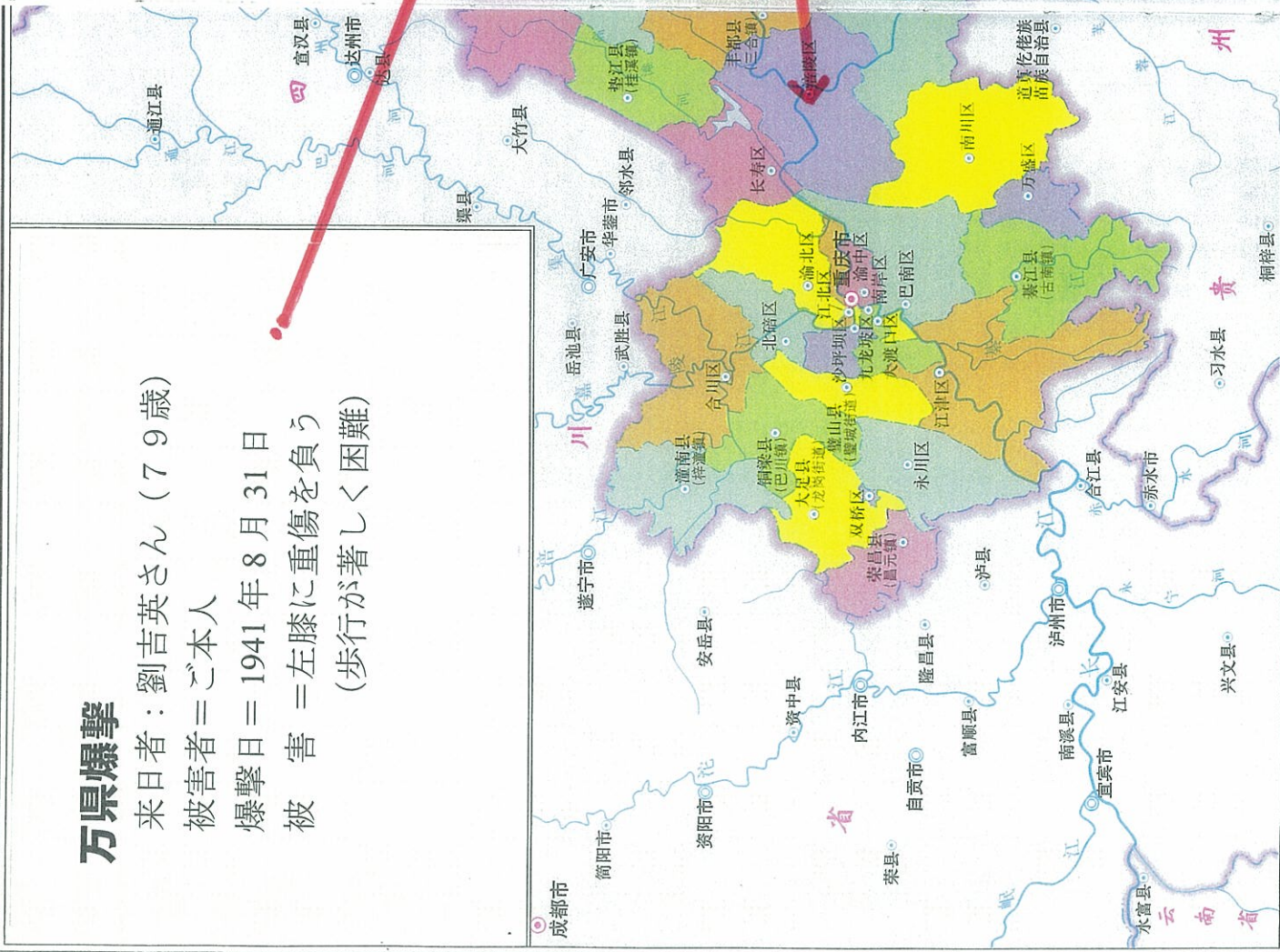
万県爆撃

来日者：劉吉英さん（79歳）

被害者＝ご本人

爆撃日＝1941年8月31日

被害＝左膝に重傷を負う
（歩行が著しく困難）



涪陵爆撃

来日者：劉鳳蘭さん（48歳）

被害者＝母親の張開俊さん（82歳）

爆撃日＝1940年5月30日

被害＝左腕を肩のつけ根から失う

